

《资本论》中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整体性透视

李傲挺

摘要: 学界一直存在关于《资本论》中是否有生态批判的争论。事实上, 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思想贯穿于《资本论》的文本内容, 寓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与具体资本形式的批判之中, 并呈现出整体性特征。《资本论》中马克思生态批判的整体性根植于《资本论》的整体性, 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其生成过程表现为随着马克思批判视域的转换而呈现出向现实生活逐层深入的整体性趋势; 第二, 其内容体系表现为纵向覆盖资本主义产生、演化、增殖直至灭亡的全周期, 横向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方位的生态批判内容体系; 第三, 其逻辑结构表现为“生态自反性的抽象的一般可能——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生态自反性的现实化过程——资本主义具体的经济形式中的反生态行为”的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整体性, 由此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理论整体。

关键词: 生态批判; 整体性;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A811.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4)04-0011-11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4.04.001

国内外学界一直都有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到底有没有生态思想的争论, 甚至今天仍然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思想之一是‘技术决定论’, 它以生产力的线性进步为前提, 以‘统治自然’为目的”^{[1] (P45)}。《资本论》中生态思想之所以饱受争议, 主要是由于“生态科学”的成熟晚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 因此《资本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生态”一词。但是, 无论是马克思晚年在信件与笔记中表露出对尚处于雏形中的“生态学”的强烈兴趣, 还是马克思本人与达尔文、海克尔、兰彻斯特等当时最优秀的生态学奠基人的交往, 都说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有着清晰的生态学视野。海克尔首次将生态学定义为“有机体与周遭外部世界关系的全部科学, 广义上可以将生物的周遭外部世界理解为存在的所有条件”^[2], 这明确了“生态学”事实上包含三个要素: 生物、与生物有关的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国学者马世骏进一步将“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3] (P7)}也纳入生态学的研究视域中。按照这一定义, 当马克思论及资本运动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双向影响时, 就已经进入了“生态”的语境。《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马克思还曾将其副标题设置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相较于不存在“价值预设”的生态科学,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观照天然地带有“批判”视角, 即不仅仅寻求在技术层次对自然生态的干预, 而且通过对资本主义自反性生产方式产生根源的揭示与扬弃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因此, 《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思想”, 即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细胞入手, 通过对资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考察, 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 指明了资本主义产生、扩散并最终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 以及融贯于《资本论》的

作者简介: 李傲挺,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oting1995@126.com (天津 300381)

文本结构而呈现出整体性的叙事逻辑。

一、资本主义生态自反性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生态批判

《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主要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中包含的各方面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4] (P47)}因此，马克思以商品细胞作为微观切口，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商品和货币理论”中，马克思阐明了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不仅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种矛盾的萌芽，而且也蕴含着“反生态”的基因缺陷。商品就其本质是蕴含着人类劳动的自然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4] (P48)}，这种非“悬空”的“有用性”取决于“商品体的属性”，并构成了商品五光十色的物质外壳，成为社会财富的物质形式，同时也是商品社会属性的物质载体。马克思从商品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方面出发，阐明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但是这种统一并不是内在的一致性，而是互不兼容的相互对立，“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4] (P104)}。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矛盾的根源在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这构成了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并由此发展产生了货币。货币的出现并未消除商品本身的内在矛盾，而是将其外化为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立。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打破了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推动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化，但是却使得原先的物物交换转化为买和卖这两个相互独立且对立的过程。由此，私人劳动的价值实现问题，即完成商品向货币转化的“惊险的跳跃”成为商品生产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也是他们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的主要动力，并“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4] (P156)}。商品的自然属性被社会属性所湮灭，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成为待实现的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4] (P155)}，这不仅构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最一般的可能性和最抽象的形式，同时也为商品生产超脱于人的消费能力，甚至突破自然的承载力埋下伏笔。

第二，在“剩余价值生产与资本积累理论”中，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化造成人与自然对立加剧的内在机制，明确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一个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的过程，也是资本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破坏性特征的根源不是在增长中，而是在资本主义积累中”^[5]。首先，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4] (P587)}马克思将外界的自然条件划分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与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前者是与人的生存资源的获取息息相关；后者则与人的发展空间的扩展关系密切。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较高阶段的生产方式，其出现的必要条件是人对第二类自然富源也就是生产资料的利用，资本主义天性中带有将一切自然力转换为自身增殖扩张动力的倾向。其次，马克思阐明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对立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 (P207、208)}。它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同时也是人的现实的劳动过程，其最初目的是将自然物改造成符合人生存、发展需求的物质资料。另一方面，“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4] (P487)}，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不再仅仅以使用价值作为生产目的，而不断地追寻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永恒使命。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增殖来自对劳动力使用价值与自然资源的双重压榨，尤其是剩余

价值的进一步资本化，在推动资本迅速扩张的同时，也放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工人与自然的剥削效应，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4] (P697)}，而随着这种盲目扩张的生产超过了社会与自然的承载力，生态危机就会伴随着自然危机一同到来。最后，马克思阐明剩余价值生产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周期性波动，造成了自然资源与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这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负效应不断加深，并最终导致席卷世界的生态问题。资本增殖的内在需求催生出工厂大工业的生产模式，加速了资本的增殖速度，资本主义获得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4] (P519)}。但是这种生产效率提升与扩张速度加快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前所未有地对劳动力商品与自然资源的虹吸。马克思指出，“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携手并进的”^{[4] (P696)}，“任何追加的劳动消耗都要求相应地追加原料的消耗”^{[4] (P697)}。也就是说，资本的扩张是以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双重损耗为代价的，被剩余价值攫取与扩张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陷入盲目的“热病似的生产”，进而导致“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4] (P522)}。事实上，自然在资本主义工业的生命周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繁荣时期，自然资源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燃料；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与危机阶段则被大量浪费与闲置；而在资本主义的停滞与复苏阶段，又承担起进入下一个繁荣周期的物质基础。事实上，资本主义每一次从复苏到危机的周期循环，都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与自然资源的巨量浪费，并逐渐超过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而不断累积、酝酿成为席卷世界的生态危机。

第三，马克思还阐明了资本主导下的科学技术走向了自然的反面，成为不断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要素与压迫工人与自然的帮凶。马克思指出，“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4] (P699)}。换言之，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生产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因而相对少的资本投入，能够撬动比原来更大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因此科学技术反而成为资本主义生态自反效应的催化剂。这事实上加剧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 (P580)}。科学技术负效应的显现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宰制，因而回归其人与自然交往的中介的原初属性，仍有待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扬弃。

二、生态自反性的扩大与加深：资本流通过程的生态批判

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反生态属性的根源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进一步考察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正是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过程中得以进一步扩大与加深。

第一，在资本循环理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流通过程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形态的变换过程。产业资本分别在时间上依次转化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则并存。三种资本职能形式转换的根本目的是价值增殖，因此资本循环也被剩余价值规律所主导，呈现出加速且扩大的态势，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损耗。首先，马克思分析了产业资本形态转换过程中的辅助材料的消耗问题。“这样一些辅助材料，它们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时由劳动资料本身消费掉，例如煤炭由蒸汽机消费掉，或者对过程只起协助作用，例如照明用的煤气等等——

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不过它们的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6] (P178)} 马克思指出这部分材料的特殊性：其一，同固定资本相比，这部分是一次投入一次收回的资本，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其二，其价值不发生变化，而是全部转移进产品之中，每次生产的开始都以辅助材料的更新为前提，“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来说，必须全部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6] (P178)}。这类资本就其自然属性而言，通常是自然界中的能源物质，能够将其化学能转化为人类所需的机械能；就其社会属性而言，这类资本的使用是资本循环得以展开的物质基础，资本循环的速度直接影响着它们的消耗程度。其次，马克思阐明了剩余价值生产主导下的资本流通过程呈现出速度加快且范围扩大的态势，加剧了对这类辅助材料的消耗。一方面，资本流通过程耗费的时间呈不断缩短的趋势，这是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6] (P142)}。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的支配下，资本流通过程有着不断加速的倾向，流通周期的缩短使得单位时间内资本履行生产职能的次数更多，这使得辅助材料的更新速度加快。另一方面，资本流通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6] (P127)}。资本流通范围的扩大化与资本流通速度缩短的双向叠加，使得被剩余价值生产所裹挟的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耗费资源的速度与数量，在短时间内增长到一个令人瞩目的程度，这种“大加速”驱使人类文明不断接近“行星边界”的安全极限^[7]。

第二，在资本周转理论中，马克思阐明固定资本的更新不仅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大量生产、大量浪费的生产方式产生的直接原因，从这一点来看，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发生机制具有相通性。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发生价值的增殖，而只发生价值的转移，但是同流动资本相比，其价值转移并非随着生产过程的结束而一次完成，而是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稳定实现。这样就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形成了一组矛盾：一方面，生产发展带来有机构成的提高，固定资本投资的价值量与质量提高，能使用更长的年限；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也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6] (P206-207)}，即在报废前就得被替换掉。而在经济危机到来时，随着消费不振与生产停滞，资本家通常会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6] (P207)}，固定资本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为下一阶段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与资源浪费的到来埋下伏笔。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社会消费能力相对萎缩的情况下，资本逻辑下的生产端的固定资本更新表现为一种重复的、浪费的消耗，每一轮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带来的生产繁荣背后，其代价都是海量的资源损耗，而如此反复几轮以后，伴随着经济危机到来的还有恢复周期漫长的生态危机。此外，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固定资本更新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带来自然资源消耗的加剧，其原因在于相对于固定资本更新引起的货币资本的投入，自然资源的消耗表现为“不费分文”的特征。马克思指出，“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6] (P394)}。自然资源的“不费分文”的公共属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构成了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中生态自反性的根源。

第三，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马克思从人对自然价值补偿断裂的角度，阐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反生态属性。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在实物形态维度，分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在价值形态维度，分为不变资本（ c ）、可变资本（ v ）与剩余价值（ m ）。两部类必须保持平衡，社会交换才能得以持续，因此明确社会再生产的核心与先决条件在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物补偿与价值补偿问题，即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为 $I (v+m) = II c$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则表现为 $I (v+\Delta v+m/$

$x) = II (c + \Delta c)$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只有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补偿，而没有涉及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补偿，因此在传统马克思两大部类的基础上，将环境资源拓展为第三部类，即原有的生产资料部类、生活资料部类和资源环境部类^[8]。在“三大部类”再生产的理论模型下，就必须对自然资源进行补偿，以维持三部类的平衡，保障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事实上，《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关注到了对自然的价值补偿问题，但是由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化尚处于初级阶段，自然资源损耗过度的负效应还未完全显现，因此马克思对自然的补偿问题主要集中于农业领域。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谈到了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导致土地肥力无法得到补偿，“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 (P579)}，可见马克思认为将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回归土地是保持土地肥力的必要条件，并最终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出现。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对自然的价值补偿能够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与自然矛盾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马克思以林木护养为例指出：“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6] (P272)} 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源自其根深蒂固的基本矛盾，其对自然的补偿也更多的是攫取经济利益，因此要破除资本主义的生态悖论只能诉诸对其生产方式的全面扬弃。

三、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对具体资本形式的生态批判

《资本论》第3卷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论述，即“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9] (P29)}，主要论及了资本在现实社会中、在各种现实关系交织下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由前两卷中的生产、流通过程中资本主义生态自反性的一般性揭示，转向在对商人资本、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级差地租等具体资本行为中反生态效应产生机制的具体阐释，从而形成了“抽象-具体”的生态批判框架。

第一，马克思分析利润率平均化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过程，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与浪费，从而引发对自然的巨大破坏。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与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固定资本的增加与劳动者数量的减少使得“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并且这一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利润率会下降，而利润量会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9] (P276)}，因此资本家不得不依靠加大投资，增加预付资本通过扩大利润的绝对数量来弥补利润率下降带来的利润的损失。盲目地扩大投资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与混乱，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这种扩大生产以增加利润的欲望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脱离一切消费、资源、社会关系的限制，甚至“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这导致：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进一步加剧了日益膨胀的生产端与日益萎缩的消费端之间的不平衡，不得不依靠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以重新恢复社会生产和消费平衡，而每一次生产过剩的重新出现都是对自然资源与社会劳动的巨大损耗；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生产的生态负效应，人类劳动生产率提高走向了自然的反面，“自然条件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9] (P289)}，进一步出现了“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9] (P289)}，资本无限制地发展自我最终也将埋葬自我。

第二，在商人资本部分，马克思分析了商人资本独立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失控，甚至随着商人资本的世界贸易，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扩散至全世界。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是从产业资本中

分离出来的独立的资本形态,是商品销售这一产业资本环节的独立化。商人资本的出现促进了流通效率,在历史上也有着加速旧生产方式解体的积极意义。但是当商人资本完全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就隔断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联系,商人的各种囤积、炒作行为,延长了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时间,制造出虚假的繁荣,更加剧了生产的盲目性。这样,商人资本就实现了对生产过程的侵蚀,不仅“使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9] (P368)},而且“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9] (P339)},使得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越来越转化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商人资本对生产过程的绑架是资本主义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浪费生产方式的催化剂,推动生产过剩的规模扩大,也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属性。同时,“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9] (P370)}。商人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将资本主义反生态的生产模式向全世界扩张,也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局部性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转化为波及全世界的生态危机。

第三,马克思在地租理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明确土地耕作中短视行为的发生机制,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自然力的统摄与剥削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源。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对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负效应还未完全显现,而资本主义对自然破坏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土壤肥力的降低,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直接表述集中出现在这一部分。在地租理论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天然占有从土地资本家那里分割的剩余价值,因此是从经济层面体现了土地所有者对其土地拥有的占有权,“一切形式的地租,实质上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中分配出来的,都是以占有自然生产力为基础的”^[10]。其次,马克思将地租的基本形式划分为绝对地租、级差地租与垄断地租,并进一步把级差地租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两类。其中,前者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和地理区位的差异;后者的形成则是因为对一块土地连续追加投资所导致的生产率的差别。级差地租Ⅱ来源于农业资本家对特定土地的追加投资,是通过对土地条件的改良来获得的收入,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属于土地所有者,所以租期结束,改良过的土地又重新回到土地所有者手中,这就引发了土地租期内的短视行为:农业资本家倾向于掠夺式的开发土地;土地所有者则尽可能地缩短租期。这就造成“向较坏土地发展,决不是任意选择的,而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只能是必然性的结果”^{[9] (P754)},即土地肥力变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不可逆的过程,这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空间资源有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性的矛盾^[11]。最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对自然力的剥削与压榨的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产生。马克思将自然力看作一切生产活动中不可替代的总体动力,包含“人身自然力”“社会劳动自然力”与“自然界自然力”三类。人的生产活动就是三种自然力的和谐统一,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所有的自然力都裹挟进剩余价值的生产之中,“这种无偿的自然力,像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9] (P843)}。资本驱使下的自然力被破坏式地利用,“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9] (P919)},最终资本对自然力的破坏达到一个临界点,自然力的发展失衡,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最终出现。

四、《资本论》中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整体性

《资本论》中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呈现出显著的整体性,其既来源于自身生成过程的整体性,也来源于《资本论》本身的内容体系与逻辑结构的整体性。具体而言,其一,马克思生态批判作

为对资本主义整体批判的一个维度，耦合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逻辑的历史演进之中，呈现出向现实社会不断深入的整体性特征。其二，《资本论》中生态批判阐明了资本主义商品细胞中根深蒂固的反生态的基因缺陷，通过资本的产生、复制、增殖最终逐渐演变为席卷世界的生态危机的发生机制，表现出内容体系的整体性；其三，马克思生态批判内嵌于《资本论》本身的叙事逻辑的整体性，嵌合于马克思“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逻辑的展开，而呈现出逻辑结构的整体性。

（一）《资本论》中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生成过程的整体性

从横向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总体批判，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为基础，并指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环节；从纵向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逐层深入的演进过程，最终在《资本论》中揭示出资本主义自反式发展的历史之谜的答案，正因如此，《资本论》显示出“哲学-经济学”的一体性特征^[12]。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也即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扭曲关系的反思始终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总体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最基本的生存关系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不自由状态的最直接的现实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被资本逻辑所宰制。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一直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生态视野，并随着马克思批判视域的转换而呈现出向现实社会生活逐层深入的整体性趋势。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显露出要立足于现实世界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立场，这是《资本论》中生态批判思想确立的逻辑前提。马克思强调，“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13] (P76)}，而哲学只有陷入它所反对的现实世界的“缺陷”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仍带有黑格尔哲学的影子，但是他明确了哲学“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3] (P75)}，实质上开启了从现实生活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道路。沿着“面向现象世界”的道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时期，他在现实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统摄，物质利益凌驾于人的生存权利之上，按照正义逻辑建立的国家与法却为私权辩护，这是马克思进行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肇始。从自然界中捡拾枯枝以供生活取暖，这是自然给予每个人平等的生存权利，是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然结成的生存关系，是“一种友好的、比人类力量还要人道的力量”^{[13] (P252)}。然而，人与自然之间这种最基本的生存关系也被私人利益所割裂，林木所有者的所谓“先占权”凌驾于人的生存权之上，国家机器“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13] (P267)}。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时期，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集中于对私有利益统摄人与自然关系，以国家机器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行为的控诉。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根植于人与人之间的私有利益，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工具，而仅止于形而上的道德与法的层次。

《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学与哲学维度首次进行了理论化的生态批判，明确了立足于现实人类社会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路径。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进行了逻辑化的理论建构，一方面，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置于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明确“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14] (P187)}，从人类所有制演变的角度明确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暂时性，虽然这一时期还未形成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与框架，但是实际上已经奠定了立足于现实的人类社会，从人类社会演进历史去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批判基本理路。另一方面，马克思抓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即“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14] (P184)}，从劳动关系入手分析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社会根源，从而找到了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立足点。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巴黎手稿》中马克思

思已经明确了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路，但是马克思以“类”概念来理解劳动，使得其生态批判叙事当中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更多地局限于思辨层面。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工具，因而对其批判也得以进一步向现实社会深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里，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传统的德国哲学家们对批判理解的局限性，即“相信他们的批判的思想活动一定会使现存的东西灭亡，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或者认为有他们的孤立的思想活动就已足够”^{[14] (P510)}。因此，马克思同德国哲学家们以“现实的影子”作为批判标的的“幼稚的空想”划清界限，并进一步将批判的视角延伸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领域，这也推动着马克思的生态批判逻辑发生全面的变革。马克思将“实证”的方法引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中，以“经验的事实”为基础，“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4] (P528)}。这样，马克思发现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或“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而在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4] (P520)}。将生态批判的立足点由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方式，这为《资本论》中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核心来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埋下伏笔。

总的而言，《资本论》中的生态批判叙事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随着马克思理论思索的演进，呈现出整体性特征：一方面，从《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就确定了立足于现实世界，进行人与自然关系反思的基本路径，并一路延伸至《资本论》中，这一过程是向现实世界逐层深入，最终从资本的产生、演化与增殖过程角度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过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确立所引发的哲学变革对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生态批判作为马克思资本主义整体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横向维度，耦合于马克思各个时期文本中对资本主义的剖析；而且在纵向维度，寓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整体批判由哲学视域转向政治经济学视域的演进过程之中。

（二）《资本论》中马克思生态批判的内容体系的整体性

《资本论》作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其研究的展开是放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庞大的、复杂的整体中进行的，这决定了《资本论》内容体系的整体性，也是《资本论》中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整体性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清楚了资本主义“商品细胞”中的基因缺陷，以及这一内生缺陷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复制与扩大，“使自然资源的利用率远高于自然资源的再生速率”^[15]，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当中不可根治的“生态之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5] (P13)} 在马克思的构想中，《资本论》是包含资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与各种具体形式的完整整体，若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则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囊括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创生、演化规律。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生态自反性贯穿于这一整个的论证过程。首先，马克思从商品细胞的萌芽入手，阐明蕴含其中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固有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商品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商品转化为货币，商品的社会属性湮灭了自然属性，在生产中则表现为剩余价值生产主导了物质资料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确立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呈现出盲目性，以及不可遏制的大量生产与浪费对自然的破坏。其次，资本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在流通中完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推动自身的复制与扩大。马克思分析资本流通中剩余价值的产生与资本流通时间呈反比，因此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存在不断加速的倾向，且这种加速有脱离一切消费、原料限制的趋势，这进一步加

深了资本主义细胞中的生态自反性，出现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交织的“病症”。至此，马克思《资本论》前两卷论证清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态危机如何在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积聚并发生的，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资本论》第三卷则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社会中具体的资本形式在运动中的生态自反性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与论证。其中大致包含，利润率平均化所引发资本家盲目扩大投资、商人资本囤积行为导致生产与消费失衡的加剧、资本主义节约的反生态特征以及土地资本对自然的破坏等，从现实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自反性在社会中各个层面具体的表现及其影响。

总的而言，《资本论》中生态批判的内容体系的整体性寓于《资本论》本身的结构整体性之中。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态自反性，源于商品的内在矛盾，生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扩大并加深于资本主义流通过程，具体表现于各个具体的资本形式，从而形成了一个纵向覆盖资本主义产生、演化、增殖直至灭亡的全周期；横向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方位的生态批判内容体系，从根源上明确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发生机制。

（三）《资本论》中马克思生态批判的逻辑结构的整体性

1865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道：“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16] (P231)}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一个整体，最终都落脚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17]，因此，这一方法“不是《资本论》的方法之一，而是《资本论》的总的方法”^[18]，无论是《资本论》的总体设计还是每一卷的内部结构都是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展开的，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整体。一方面，《资本论》分篇计划是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制定的，从《导言》中著名的“五篇”计划到后来的“六册结构”，马克思都是按照从一般的抽象规定到具体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设计的，马克思在理论架构之初就从抽象到具体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联系。另一方面，《资本论》前三卷中每一卷的具体结构也是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展开的。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前提（商品、生产、交换与货币流通）到特殊前提（劳动力成为商品）；从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形式（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到各种具体形式（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再到剩余价值的具体转化形式（工资以及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在抽象概念向具体概念的转化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第二卷马克思阐释了资本的一般流通形式（资本循环）到资本的具体流通形式（资本周转中资本形态的变化），最后到再生产过程也即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形式。第三卷是前两卷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但是具体考察的是资本总运动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的经济形式，如产业资本、商人资本等，其考察对象进一步向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入。总的而言，《资本论》每一卷都是从简单、抽象、本质的层次逐步展开为复杂、具体的层次，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是透视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研究整体性的窗口，“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表现出来”^[19]。

《资本论》中马克思生态批判叙事逻辑的整体性也根植于《资本论》本身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首先，马克思从商品细胞中具体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以及货币的出现使得这种矛盾进一步放大，造成了商品的社会属性湮灭了其物质属性，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自然物都有着被货币化的倾向，得出了生态危机的抽象的一般可能性。其次，这种抽象的一般可能性，借助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进一步现实化。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既是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而后者主导了生产造成物质生产的无序与盲目扩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不断加速加剧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失衡，最终造成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扩大与周期的缩短进一步造成大量浪费，最终生态危机由抽象可能转为现实可能。最后，马克思在资本总运动

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的经济形式中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生态自反性表现的具体形式,例如商业资本的囤积行为、农业资本的短视行为等。由此构成了“生态自反性的抽象的一般可能——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生态自反性的现实化过程——资本主义具体的经济形式的反生态行为”的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整体性。

五、结 论

尽管“生态科学”系统、广泛的研究成型于马克思逝世以后,且马克思文本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生态”一词。但是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生于世界的原生关系之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是资本主义对人的束缚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事实上已经进入了生态批判的范畴,并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产生、发展与增殖过程对人与自然双向剥削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呈现出整体性特征。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自然资源尚丰富易得,生态问题并非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所以生态批判不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而是寓于马克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事中,从属于资本主义总体批判的维度之一,也是资本主义自反式发展逻辑在生态方面的佐证。正因如此,整体性视角是准确完整地透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生态批判”思想的基本视角,也就是说必须进入到马克思的文本叙事,从内容整体性、逻辑整体性与思想嬗变整体性等方面才能还原“生态批判”在其中的“生态位”,人为地放大或贬低“生态批判”在《资本论》中的定位都是不可取的,其实质都是对整体性视角的割裂。但是,不可否认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已经揭示了资本的一般特性与运动规律,并明晰了资本的生态自反性的发生机制及其演变成生态危机的内在原理,这正是《资本论》中生态批判思想超越时代局限性的永恒价值所在。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就是合理地驾驭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的生态批判,揭示了资本的一般特性与运动规律,明晰资本的生态自反性的发生机制,这为我们驾驭资本,发挥其积极作用而避免其生态负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Honneth, A. *The Idea of Socialism: Towards a Renewal*[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 [2] 马振兴, 胡泽, 张伟, 等. 中、外文“生态学”一词之最初起源及定义考证[J]. 生物学通报, 2017(11).
- [3] 林育真, 付荣恕. 生态学(第2版)[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Vergara-Camus, L. Capitalism, democracy, and the degrowth horizon[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19(2).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周岳. 伊恩·安格斯“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评析[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 [8] 李忠民, 姚宇.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与低碳经济的发展[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5).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Kei, E. Reconstructing Marxian theory of ground rent: Based on Japanese development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23(4).
- [11] 张秀华, 赵晶晶. 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的三重论域[J]. 理论探讨, 2024(2).

- [12]李天慧,张润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再研究——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形而上学方法质疑的回应[J].北京社会科学,2024(2).
-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乔剑梅.“自然资源价值”论的内在缺陷——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李佃来.关于《资本论》创作方法的再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23(11).
- [18]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 [19]张雷声.《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arx's Ecological Criticism in *Capital*

LI Ao-ting

Abstrac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debate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bout whether there is an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in *Capital*. In fact, Marx's ecological critical thinking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apital* and is integrated with Marx's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process, circulation process, and specific forms of capital, presenting holistic characteristic. This holistic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rooted from the holistic nature of *Capital*,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s generation process is manifested as a trend of deepening into real society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t theoretical research from philosophy to political economy; Secondly, its content system covers the entire process of capitalist creation, evolution, proliferation, and even extinction; Thirdly, its logical structure is from abstract to reality, namely, abstract possibility of ecological crisis —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risis becoming a realit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 the anti ecological behavior in specific economic forms of capitalism, thus forming a theoretical whole with complete structure.

Key words: ecological criticism; holistic; *Capital*; political economics

(责任编辑 孙洁)